

陈会颖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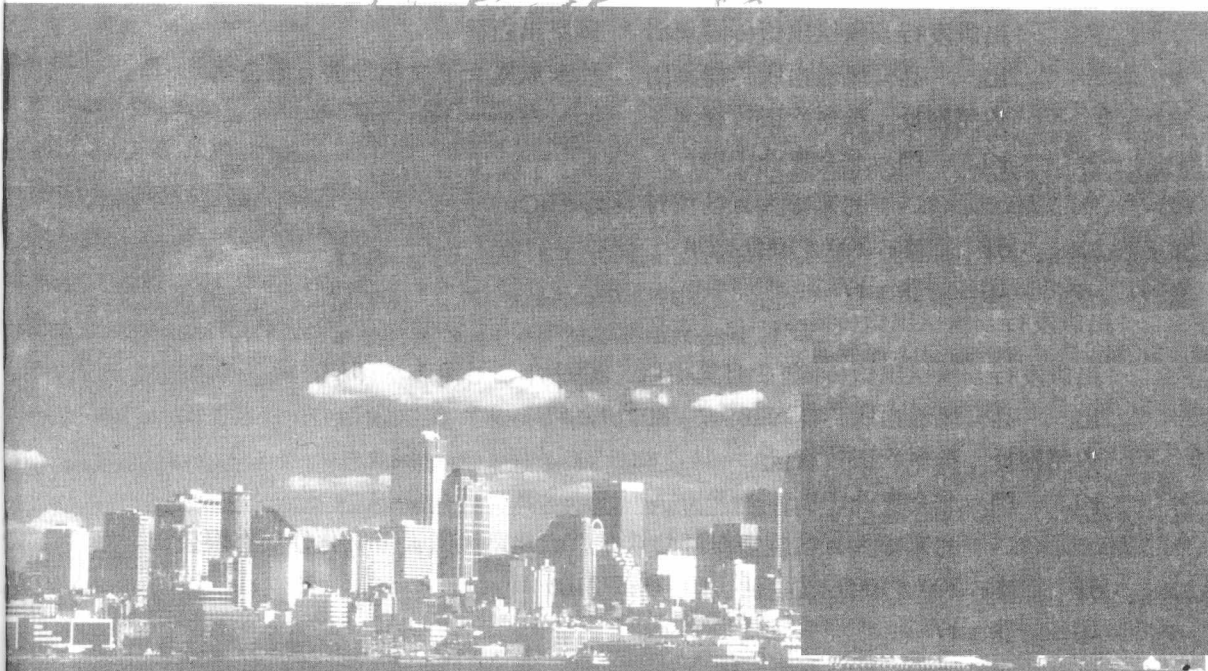
大國崛起的文化解读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陈会颖 著

大国崛起的文化解读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崛起的文化解读/陈会颖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9.6

ISBN 978 - 7 - 80729 - 471 - 9

I. 大… II. 陈… III. 文化史—研究—世界 IV. 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7639 号

书 名 大国崛起的文化解读

著 者 陈会颖

责任编辑 李 楠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卫星城东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7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729 - 471 - 9

定 价 28.00 元

(本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或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发行部调换,联系电话:010-58572106)

从《大国崛起》看各国富强之道

（代序）

吴敬琏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文献纪录片《大国崛起》广受瞩目。虽然在我看来这部片子的标题并不十分恰切，因为问题并不在于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崛起”为称雄一时的“大国”，人民的福祉、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是最重要的。但是，由于这部片子能够用生动的视觉形象普及世界历史知识，促使国人睁眼看世界，进而认真思考如何把自己的民族振兴之路走得更好，它仍然值得大力肯定。

中华民族正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这条道路是不平坦的。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像《大国崛起》开篇语所说的那样，“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也就是说，发挥我们的“后发性优势”，向先行国家学习，认真汲取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少交学费，少走弯路，缩短现代化的行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纪录片提到的9个曾经称霸一方或称霸世界的“大国”外，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也是值得汲取的。比如说瑞典，这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小国”，在近代也没有什么赫赫武功，但是它在提高人民的普遍福利上为世人所广泛称道，也有不少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注意。

在各国走向繁荣昌盛的过程中，有一些共同的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对这些共同因素的偏离，不论这种偏离朝向哪个方向，总会招致逆转和挫折。通观500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这种共同的要素大致包括以下这些：（1）确立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2）建立法治；（3）实行宪政民主；（4）保证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5）逐步形成了“橄榄形的社会结构”。

以下分别对这五个要素作一些分析：

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正如 D. 诺斯所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这里所讲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就是市场经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由市场经济。

在目前的中国，相信计划经济（命令经济）较之市场经济更具优势的人已经很少了。容易发生的误解，是由于忽视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于决策的自主性和交易的自愿性，而把它和 16—18 世纪一些西欧国家实行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混为一谈。在重商主义条件下，虽然货币交换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交换形态，市场和商业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它具有两个和市场经济很不相同的特点：一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强力干预和全面控制，而不是由市场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二是把尽可能多地积累货币财富作为国家目标，而不是由个人和企业的最大化目标驱动。

西欧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不改变重商主义的体制和政策，确立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一个国家就难以实现持久的繁荣，只会“崛而不起”或者“起而复衰”。西班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16 世纪初，它凭借从事航海活动的先发优势和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一度成为海上霸主和最大的殖民国家，并且在查理五世的统治下建立了横跨欧洲大陆的哈布斯堡王朝。但是重商主义政策并没有给西班牙带来持久的繁荣。这是因为：第一，虽然西班牙政府在殖民活动中攫取了大量财富（据历史资料记载，1503—1660 年间西班牙从美洲殖民地取得的财富多达白银 18600 吨和黄金 200 吨），然而这些财富并没有被投入生产活动，相反，为了维持欧洲最庞大的军事力量，西班牙政府的财政收支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1557—1647 年间，西班牙皇室 6 次宣布破产。第二，大量贵金属的流入一方面造成了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另一方面助长了穷奢极欲的社会风气 and 好逸恶劳的懒惰习气，而农业生产一直停滞不前，制造业也没有能够发展起来。第三，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造成了普遍的寻租条件。由于“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重商主义时代乃是一种腐败的寻租社会”。这样，西班牙经济在 16 世纪后期“马尔

萨斯灾祸”再次袭来和经济衰退重现时一蹶不振。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大败于英国海军，更标志着西班牙海上霸权的丧失。1596年菲利普二世去世以后，西班牙沦为二流国家。它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已是独裁者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在1975年去世以后的事情。16—18世纪的法国历史，也向我们讲述了相同的故事。

和西班牙在17世纪陷入衰退完全不同，这个世纪是英国由二流国家走向兴盛的转折点。这里的决定性因素，正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早在1215年的《大宪章》中，英国已经开始对国王的征税权作出了限制。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国王的垄断特权被国会立法所终止，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私有产权制度得以确立。随后，英国政府逐渐减弱了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可以说是对重商主义最后的致命一击。《国富论》弘扬“看不见的手”（即市场）在资源有效配置中的作用，同时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自然和自由的制度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而政府的控制、干预和垄断，则会对经济造成破坏。由《国富论》开创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正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产业革命的先声。因此，历史学家A. 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叔父——老A. 汤因比在1884年出版的《产业革命》一书中就已指出，产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纺织工业中引人注目的变革，也不是蒸汽机的发展，而是“用竞争取代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中世纪规则”。

“二战”后某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建立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以及它们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也带有某些重商主义色彩，因此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从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中国台湾）的发展经历可以看到，这种制度和政策安排在发展初期是有效的，但是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进一步市场化，否则会引来种种恶果。

法治

实行法治，即符合公认正义的法律（“善法”）的统治，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共有的特征。而法治不但具有值得追求的普世价值，而且是非人格化交换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支撑，因而实行法治

乃是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所以讲英国走向兴盛的历史，通常都要从作为法治滥觞的1215年《大宪章》讲起。

在法治的问题上，有两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第一，分清“法治”（rule or law）与“法制”（rule by law）两个不同的概念。自从先秦法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中国的大多数皇朝都强调“法”和“法制”（有时也写作“法治”）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百代都行秦政制”。但直到现在，仍然有人认为法制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我们只要“恪守祖制”就可以了，大可不必向西方学习和引进法治的思想和制度。其实，先秦法家所说的“任法而治”和中国历代帝王所说的“法制”，跟现代社会的“法治”完全不是一回事。韩非说得很清楚，法家所说的“法”是与“势”“术”相并列的帝王手中的统治工具，是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的手段，而他们自己却可以“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最先提出以法治取代人治的思想。1997年的十五大又正式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口号。但是中国法治国家建设推进得并不顺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法治的性质和内容缺乏明晰的认识，而且实行法治必然要求约束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这是不符合某些官员的意愿的。所以即使在十五大以后，党政领导机关的一些正式文件也经常用“法制”来代换“法治”，把法律降到了政府统治和管理人民的手段中的地位。就以《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来说，好几位学者论述法治的讲话在变成字幕或解说词时，也都变成了“法制”。只说“法制”而不说“法治”，实际上抽掉了法治的精髓，回到以法律作为统治工具的“人治”。

第二，法治与民主的实施顺序。在有些国家的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实施是有先有后的。以英国为例，1215年的《大宪章》可以说是法治的滥觞，1688年“光荣革命”才是民主制度的开端。可见二者的构建是可以有先有后的。但是历史经验也表明，法治归根结底要以民主制度为基础，要靠民主制度来保证。有人以回归前的香港为例，认为在英国派出的总督治理下实行法治和“积极的不予干预政策”，也能保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这种论证似乎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殖民地时代香港的法律体系是依托于它的宗主国——英国的政治制度的，而英国实行的是民主政治。如果换一个国家，例如作为前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宾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法治始终无法在这些国家确立就是一个

证明。关于这一点，在 D. 诺斯的著作中有十分精辟的分析，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宪政民主

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是文明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在“五四”运动提出要请进“德先生”以来，似乎没有太多争议。但也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

第一，可否以“威权主义政治”作为通向民主制的过渡。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讨论“新权威主义”时，就有论者以新加坡为例论证在发展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实行威权政治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在当时，我也觉得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是根据新加坡近年来的经验，我认为现在至少可以认定，在知识经济时代，按照儒家“三纲六纪”“尊尊亲亲”等原则实行威权主义政治，由于它会压抑创新精神，不利于人们创造力的发挥，已经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2000 年以来新加坡的李光耀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应当加以注意。

第二，以何种方式争取民主。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先进者的政治理念深受卢梭式的理想主义和激进观念的影响，鄙薄经验主义的点滴改良。他们没有意识到激进的理想主义的革命力量在掌握实际权力后很容易蜕变为少数人的专制。正像《大国崛起》告诉我们的，英国人从 17 世纪 40 年代革命后国会军将领克伦威尔以暴易暴、实行军事独裁中汲取了教训，摒弃暴力革命的方式，选择用和平的渐进改革推进社会进步。在中国，只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灾祸，像顾准这样的杰出思想家才敏锐地意识到，设定了某种终极目的的理想主义很容易由于其领袖人物自认为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和杀戮来实现这一终极目的而蜕变为专制主义。在认识到这一点以后，顾准大义凛然地宣称：“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第三，在确定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才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民主的真正实现。从世界各

国的历史看，民主政治制度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类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时期（1792—1794年）实行的“激进的人民民主”或“直接民主”体制；另一类则是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制度。前一种体制由于对最高权力缺乏制约，往往使作为社会主人的“人民”徒具虚名，沦为少数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charisma）专政的牺牲品。雅各宾专政后法国陷于社会动乱之中将近一个世纪。当它在19世纪70年代重新建立宪政秩序时，英国已经开始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遥遥领先于法国。后一种体制不承认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而是用一整套制衡机制保证公共权力不会被滥用和确保个人自由和宪法权利不受侵犯。

继顾准之后，中国有一大批学者对卢梭理论的演变以及雅各宾“激进的人民民主”和“直接民主”为何必然演变为“多数人的暴虐”和“领袖专制”作出了深入的批判性分析。在以史为鉴、寻求富强之道的时候，这些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研究成果，都必须纳入我们的视野之中。

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

许多学者指出，《大国崛起》有一个缺点，就是对于所论各国兴起的思想和人文基础着墨不多，甚至连文艺复兴的故乡——意大利也没有进入“大国”的行列。实际上，西欧国家的兴起，几乎无不是以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

人们往往强调技术进步对于西方国家兴起的推动，而忽视文化、思想变革和认知进步所起的作用。对此，我们应当追问，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打破中世纪宗教迫害和思想禁锢，吹响思想解放的号角，提倡用理性去批判地观察世界，人们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欲望能否得以发扬，作为18世纪以降经济革命源泉的制度和科技创新是否有可能发生？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往往过分关注国家对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拨款的多少，领导机关组织的“攻关”活动进度的快慢，而忽视了西欧国家17世纪以后教育普及和科学迅猛进步的思想和制度基础。技术史专家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教授说得正确，“在15世纪的西欧，

由于没有科层制，西方科学家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通过合作、竞争、集体解决冲突、分工、专业化、信息更新和信息交流，追寻对自然现象的解释这一共同目标，其组织效率之高往往是其他社会组织形式——科层制或非科层制——所难以比拟的”。近年来大量经济史、技术史的研究成果清楚地告诉我们，西欧先行工业化国家从早期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途径，在于与基础科学进展密切联系的技术的广泛运用，而科学和教育之所以能够在17—18世纪以后获得长足的进步，首先是由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科学和文化的繁荣准备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历史经验证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乃是繁荣科学和文化的必由之路。

“橄榄形” 社会结构的形成和中等阶层的壮大

市场经济以前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哑铃形”的社会，它的一极是少数权贵，另一极则是广大的贫苦农民。当时也存在一个主要由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组成的中等阶层（middle class，或译“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不过，他们在封建庄园制农业的汪洋大海中人数少、力量弱、地位低，左右不了社会的大局。

进入近代以后，中等阶层增加了以中小资本家（在旧中国则是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新成员。但是这个社会阶层的力量依旧单薄，仍然受制于大资产阶级（在旧中国则是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受到后者的压制和打击。

等到先行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后期全面转向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包括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作用变得愈来愈重要，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新中等阶层才开始形成和日益壮大。比较一下恩格斯1845年和1892年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作的分析，也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端倪。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专业人员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着支配作用，这使“新中等阶层”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作用凸显，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坚力量（elite，或译“精英”）。第一，他们的人数剧增，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超过了体力劳动者，成为工薪阶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美国1900年白领工人占劳动力总量的17%，到了1970年，

上升为47.5%；体力劳动者和白领工人人数比例1900年为2:1，到了1970年变成1:1.3。第二，由于中等收入阶层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发达国家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得很快，甚至超过了“以剪息票为生”的中小资产者。第三，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也大为提高。《大國崛起》中谈到的20世纪初期美国的“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和20世纪中期罗斯福新政（New Deal）打击寡头和缩小贫富差别等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等阶层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

中等阶层的兴起使传统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社会”转化为现代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哑铃形社会”通常是不稳定的，充满了动乱，而“橄榄形社会”则趋于稳定。

正在高速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结构迅速变化的时期，一个新中等阶层正在成长。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方针，这是一项基于正确社会分析作出的明智决策。然而在前一时期关于改革方向的大争论中，有些论者把分析传统社会结构时使用的二分法套用到中国当今的社会，把社会人群简单地划分为“精英”和“草根”、“权贵”和“弱势群体”、“富人”和“穷人”两类。我认为，采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把原应属于大众一边的企业家、科研人员、技术专家、医护人员、教学人员等划入与大众敌对的社会集团中去。这种做法，不但搞乱了自己的阵线，而且实际上起到了转移目标，为包括中等阶层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共同敌人，即极少数贪官污吏提供掩护的作用。近期以来，社会上发生了一连串在仇富反智思想指导下劫杀大学教授，打骂医务人员，蓄意破坏住宅、轿车等私人财产的恶性案件。这种与建设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不能不使人感到忧虑。

以上我们分析了在一些国家走向富强的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因素：市场经济、法治、民主、思想自由和社会结构中的中等阶层兴起等变化。当然，这并没有穷尽各国繁荣兴盛的奥秘。从一些国家的发展历史看，教育的普及、国民普遍福利的提升、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国民道德情操的培育，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即使是上面讲到的五个共同因素，各国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也很不相同，各有长短优劣。所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作深入的探讨。

前言

大国，永远是历史星空的最亮点；大国兴衰，则始终是历史研究的不变课题。一年前，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文献纪录片《大国崛起》再度掀起了关于这一课题的讨论热潮。其中，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的评论引起了我的关注。先生在对节目予以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关于标题，先生说：“在我看来，这部片子的标题并不十分恰切，因为问题并不在于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崛起’为称雄一时的‘大国’，人民的福祉、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是最重要的。”二是关于内容，先生说：“对于所论各国兴起的思想和人文基础着墨不多，……实际上，西欧国家的兴起，几乎无不是以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人们往往强调技术进步对于西方国家兴起的推动，而忽视文化、思想变革和认知进步所起的作用。”^①吴先生所言也正是我一直所想所思的。的确，一个国家能够崛起为称雄一时的“大国”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使这种崛起变得“可持续”，如何使这种崛起等同于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繁荣昌盛。经过一年多的阅读、思考和研究，笔者发现，破解这一难题的钥匙或许恰恰应该在被忽视的文化因素中寻找，于是就有了本书的酝酿、写作和出版。

1. 关于文化

关于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最经典的说法也许就是丹尼哈尔·莫伊尼汉的两句话：“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②

以往人们更多注重物质因素，而忽略了文化、观念、价值、国际规范化和身份认同等非物质因素的作用。^③社会的变迁归根到底受到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取决于社会物质关系的变迁。然而，单纯经济因素本身不是造成那个社会变迁的充分原因。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分析500年来大国兴衰的历史时，曾着重探讨了经济和战略之间的相互作用

用，但他同时也提醒人们不可以陷入赤裸裸的经济决定论中去。他说：“有许许多多的证据说明还有其他的東西，地理、军事组织、民族精神、结盟体制以及其他因素都能影响国际体系中各成员国的相对力量。如18世纪的联合省是欧洲最富有的地区，而俄罗斯则是最贫穷的地区——但是荷兰衰落了，俄国却勃兴了。”^④因为文明社会的主体——人，是充满着创造力的活的因素。文明社会因此而诡异多变，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就是说，物质关系对文明社会的影响并不是一种必然的宿命，它往往是通过其他关系折射而成的，精神与制度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并对文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意义。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曾举过一个例子。他说：“20世纪90年代初，我碰巧浏览了加纳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统计数据，惊讶地发现两国当时的经济水平何其相似：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致相等。在经济构成方面，初级产品、制造产品，人均收入接近希腊的水平。此外，它在巩固民主体制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加纳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1/14。发展快慢相差如此悬殊，能作何解释呢？无疑，这当中有多种因素，然而在我看来，文化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韩国人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加纳人的价值观则有所不同。简而言之，文化在起作用。”^⑤可以说，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存亡兴衰起着巨大的作用，它就像一个民族的“基因”一样决定这一民族的发展轨迹。

困难的是，文化本身具有一定的宽泛性和含糊性，在不同的学科中和不同的背景之下，有着多重的含义。广义的文化可以用来指一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包括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法律、经济组织、货币制度、宗教与思想、价值体系等各个方面。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内森·格莱泽更是认为：“文化是一个海绵似的概念，它包含的内容太多了——原先人类学上的文化定义就包含了一个群体之有别于其他群体的、除了遗传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东西。”^⑥所以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文化的定义仍是莫衷一是。不过能形成共识的是，学者们一般都认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构成其主要内容的基本价值观超越个体的生命和具体的历史时代而持续地延存下去。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等都不可解脱地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传统塑造出了它们在人类活动中的最基本的特征，也成为民族或国家相互区别开来的一个主要标志。故而本书所论及的文化就着重于

文化传统、国民特性等方面的因素。

2. 关于大国

“大国”这一概念在学术上也没有清晰明确的定义。其外延非常宽泛，以至于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或者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大国时，往往都是建立在主观基础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尽管如此，从大国概念的内涵来说，我们还是可以列举出一些公认的客观标准的，如实力因素、影响力因素、对比性因素等都可以说是一个大国应该具备的关键性因素。首先，实力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可称之为“大国”的国家必须具有相当实力。这一实力既应包括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或科技实力等以实物为特征的有形力量，也应包括以思想、意识、精神为特征的，无形的集体认同力和感召力，也就是文化力。正如英国战略家科雷里·巴尼特所言，“一个民族国家的力量并不仅仅存在于其武装部队，而且存在于其经济和技术资源；存在于用以指导其外交政策的灵活性、预见能力和果断性；存在于社会和政治机构的工作效率。最重要的是，国家力量存在于其国家本身，即存在于民族中；存在于它们的技术、能力、雄心、纪律、创造性中；存在于它们的信念、神话及其幻想中。进一步讲，还存在于这些联系的相互方式”。^①可见，一个国家大国地位的确立，是有赖于综合实力的强大。古往今来，可称之为“大国”的国家莫不如此。当然，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条件下，如在某一方面拥有突出实力，也可使一个国家问鼎大国地位，但这样的大国往往难以持久。其次，大国地位在国际政治中更多地表现为影响力因素，即以自身实力迫使他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或消除他国对己施加的不利影响，这是自古以来角逐大国地位的國家的基本目标。影响力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是实力的外在表现。此外，国家之间实力与影响力的对比，也是衡量一国国际地位不可或缺的因素。国力的强弱，只有在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中才能显现出来。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说，“一个国家的力量不应只是绝对地自我衡量”，“而要同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来看”。由此，所谓世界大国，就应该是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远比其他国家强大得多的实力和影响力的国家。

很多学者把公元1500年看做是欧洲乃至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的历史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

目 录

代 序	吴敬琏 (1)
前 言	(1)

第一章 海上帝国英吉利

一、民族形成的早期历史	(2)
1. 来自大陆持续不断的入侵和征服	(2)
2. 深受大陆影响的岛国	(4)
二、文化传统的积淀	(6)
1. 自由主义传统	(6)
天赋权利·自由主义	(7)
功利·自由主义	(9)
2. 经验主义理性	(12)
三、民族特性	(16)
1. 提倡宽容, 善于妥协	(16)
2. 倾向保守, 崇尚渐进	(21)
3. 信奉功利, 讲求实际	(24)
四、崛起之路	(26)
1. 形成民族国家	(26)
2. 确立宪政制度	(29)
3. 走向工业革命	(34)

第二章 欧陆霸国法兰西

一、历史演进	(42)
1. 成分复杂的法兰西民族	(42)
2. 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	(45)
二、文化传统	(46)
1. 理性主义精神	(46)
2. 平等主义思想	(49)

三、国民特性	(54)
1. 基于理性的爱国主义	(54)
2. 自爱·博爱·人道主义	(57)
四、强国之路	(62)
1. 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62)
2. 启蒙运动与大革命的风暴	(65)
3. 工业革命与经济发展	(69)

第三章 后起之秀德意志

一、扩张与分裂的历史	(74)
1. 从古代日耳曼部落到法兰克人的国家	(74)
2. 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盛衰	(75)
二、文化传统	(78)
1. 专制主义·军国主义	(78)
普鲁士精神的缔造	(79)
德意志的普鲁士化	(82)
自由主义在德国	(83)
2. 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85)
三、民族特性	(90)
1. 国家至上观念 (秩序·义务·服从)	(90)
2. 霸权主义扩张意识 (征服·权力·荣誉)	(94)
四、崛起之路	(100)
1. 统一民族国家观念的出现	(101)
2. 民族经济的发展	(105)
3. 民族国家的统一	(107)

第四章 横跨欧亚的俄罗斯

一、历史发展	(114)
1. 古罗斯国的建立和基督教化	(114)
2. 对外扩张和外族入侵交替的历史	(115)
3. 莫斯科公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	(116)
二、兼容东西方的文化传统	(118)
1. 文化定位的难题	(118)
2. 兼容东西方的文化	(121)

东正教信仰	(121)
专制集权思想	(124)
三、国民特性	(126)
1. 优越心理·救世意识·帝国观念	(126)
2. 权威崇拜	(132)
四、崛起之路	(135)
1. 沙皇专制·集权制度建立	(135)
2. 融入西方的脚步	(138)
3. 征服·扩张的发展道路	(141)

第五章 亚洲独秀的日本

一、历史发展	(148)
1. 迈入文明门槛	(148)
2. 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	(149)
3. 幕府时期的武家政治	(153)
二、多元复合的文化特征	(155)
1. 本土神道教的发展	(156)
2. 儒学对日本的影响	(158)
3. 佛教在日本的传播	(161)
4. 神道与儒学、佛教的融合	(163)
三、国民意识	(164)
1. 武士道精神	(164)
2. 天皇·国家主义观念	(168)
四、崛起之路	(175)
1. 近代思想观念的形成	(175)
2. 立宪君主制的确立	(180)
3. 欧化时代的变革	(182)

第六章 新兴强国美利坚

一、历史积淀	(188)
1. 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和联合	(188)
2. 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特点	(191)
二、文化传统	(194)
1. 源自欧洲的传统	(194)